

与众不同的俄罗斯汉学研究与 收藏家 K.A.斯卡奇科夫 *

(俄罗斯)鲍·利·李福清著 田大畏译

康斯坦定·安德里安诺维奇·斯卡奇科夫(K.A.Skachkov,中文名孔气)收集中国书籍和抄本之际,恐怕不会想到一百五十多年之后,他的收藏会在中国引起注意。

斯卡奇科夫 1821 年生于彼得堡^①。他的远祖是 17 世纪莫斯科统治者大贵族库奇卡。库奇卡逃亡到立陶宛,返回俄罗斯后,稍微变了一下姓氏,改为卡奇卡(意为鸭子)。又因他的一个儿子当了强盗,所以他的另一个儿子再次改姓,将卡奇卡改为斯卡奇卡,后来便成了斯卡奇科夫。

斯卡奇科夫的父母有意让儿子将来当工厂主,把他送进工业技术学校。但他在那里读了五年就离校,进了彼得堡大学,没等毕业又转入里舍利厄贵族高等学校(在敖德萨),受到农业及部分天文学教育。他对天文学情有独钟,天文学家 A.H.萨文(1810-1838)及其他知名学者讲课,他是专心的听者。1848 年他志愿去北京在俄国传教团院内建立一座小型地磁气象观测站,就是这个原因^②。

* 此文系作者为《斯卡奇科夫所藏汉籍抄本与地图题录》一书所写序言。该书即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① 本文传记部分的资料来自: Н.Веселовского, К.А.Скачков (Некролог)//Журнал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1883, № 6, с. 98-103. (Н.维谢洛夫斯基:《К.А.斯卡奇科夫(悼文)》,《国民教育部杂志》,1883 年第 6 期,第 98-103 页); П.Е.Скачкова, Константин Адрианович Скачков (1821-1883)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П.Е.斯卡奇科夫:《康斯坦定·安德里安诺维奇·斯卡奇科夫(1821-1883)传略》); Скачков К.А., Пекин в дни Тайпинского восстания. М., 1958, с.11-36. (К.А.斯卡奇科夫:《太平军起义日子里的北京》,莫斯科,1958 年,第 11-36 页)。编者按,本文注释中,引用文献为俄文的,首次出现时注出俄文名与相应的中文翻译,再次出现时则只注中文译名。

② Скачков К.А., Судьба астрономии в Китае// Журнал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1874. Т. CLXXIII, № 5, с. 13. (К.А.斯卡奇科夫:《中国天文学的命运》,《国民教育部杂志》,1874 年(卷 CLXXIII)第 5 期,第 13 页。)

有资料表明,赴中国之前,他会见过当时中国研究界的佼佼者——著名汉学家比丘林,称他为导师。斯卡奇科夫到了北京,在建立观测站进行天文观测的同时,开始学习汉语。斯卡奇科夫学习汉语花了好几年时间。他遇到了好老师。传教团雇用的中国教师有的经常不来教课,有的因为根本不称职或整日酗酒而不得不辞退,斯卡奇科夫的老师,他称之为“高教授”,每天早晨都来给他上课,月薪五两八钱,而不是其他教师所得的每月四两。另一位先生晚上来教课。他受教于中国老师,连续七年。1851年去山中休假78天,斯卡奇科夫还带了沈先生同往。斯卡奇科夫在日记中写道:“由于沈先生的缘故,大约也由于我本人的耐心的缘故,我的汉语学习已略见成效。今天是我来此的整两年,学习的成果甚至超出我的预料。我不仅已能讲相当流利的汉语,而且书籍也大致能读懂了”^①。

1853年,他在日记里总结了一年的工作:“写了和翻译了不少东西。关于农业写了104页,工艺技术方面12页,翻译《考古图》34页,《开辟历数通书》10页,汉代天文学史材料(因不懂《汉书·律历志》而未能完成)24页,详译《古今名园》22页,《救荒活民》22页,《续茶经》24页。此外,向库普费尔院士(俄罗斯科学院气象台台长)提供观测报告231页,各类通信40页。共计599页。”

而在次年年末则已经写道:“我一天工作17小时,汉语有很大进步。从今年起,我可以无需中国人的帮助而独力翻译了。”

因为斯卡奇科夫的主要工作是进行天文观测,他与钦天监及曾任钦天监监正的皇叔(奕諱,道光第五子,同治的叔辈——译者注)有了交往(皇叔也帮助他买天文善本书)。斯卡奇科夫后来回忆,钦天监人员来过他的观测站。他们对天文望远镜颇感兴趣。皇叔“起先以一副行家模样察看我们的观测站,后来竟然表示了向我学学天文学的愿望。观测厅充当了我们的课堂。但是上了第二课以后,我确信我的高贵的学生连数学也不懂,于是我们上了这门功课,效果颇佳。”^②

斯卡奇科夫把观测台的观察结果按时寄到彼得堡的科学院。西方学者也能看到这些资料。英国学者萨宾把它们发表在《论北京磁偏差引起的每日阳光变化》(*On the solar diurnal variation of the Magnetic declination at Peking*)。因为在北京观测站进行的工作成果,斯卡奇科夫后来获得“皇家钻戒奖”^③。斯卡奇科夫学会中文之后,便开始阅读和翻译中国天文学文献,因为他知道,“每一个认真研究中国的人,恐怕首先要珍视中国文学与中国科学的丰富典籍。”^④

①大多数 K.A.斯卡奇科夫日记摘自《太平军起义日子里的北京》一书。

②K.A.斯卡奇科夫:《中国天文学的命运》,第1-33页。

③H.维谢洛夫斯基:《K.A.斯卡奇科夫(悼文)》,第99页。

④Скачков К.А., Очерки Китая, СПб, 1875, с. 133. (K.A. 斯卡奇科夫:《中国概况》,圣彼得堡,1875年,第133页。)

他研究过《五礼通考》，编制过星宿名录，附有译名并指出其在天河系中的位置。后来发表《中国天文学的命运》一文。斯卡奇科夫写道：“在通过典籍了解中国天文学的过程中，我对这些典籍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兴趣。还应当说，阅读这些中国典籍时，常使我想起以前在非中国人的著作中读到过的东西。”^①在这篇天文学论文中，斯卡奇科夫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人曾从其他民族那里借鉴过天文学知识，最先是近东，然后是从希腊人、印度人、阿拉伯人那里，后来则借鉴于欧洲人。尽管如此，他认为中国天文学“可以对科学提供十分重要的贡献。它（中国天文学知识）无疑会给天文学史增添许多珍贵的篇章，它将能大大地补充和印证我们从埃及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那里获得的支离破碎的知识”^②。

关于中国天文学典籍，他在这篇论文中写道：“鲁勉采夫博物馆现藏‘天’类（中国）著作74种，另将入藏11种，堪称欧洲最完整的[中国]天文学研究著作收藏，但毫无疑问这仅是中国保存至今的此类图书的四分之一。事实让我深信，图书方面，在中国最难的事莫过于找到天文学善本，因为这正是中国人最少问津的书籍；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这被认为是一门高深莫测的学问。”^③

斯卡奇科夫本人也多次谈到翻译天文学书籍之难，其中充满当时词典中未见解说的专门术语。他还曾引用著名法国汉学家斯坦尼斯拉夫·儒莲（Stanislav Julien, 1799-1873）信中的话，说他情愿翻译几十页中国经典，也不愿翻译几行天文学著作。

著名东方学家H. 维谢洛夫斯基在追悼斯卡奇科夫的文章中写道：“可以说，斯卡奇科夫克服了所有这些障碍，在一定意义上，是建立了功勋。”^④遗憾的是，对他留下的大量天文学手稿，至今没有人进行科学的著录。

斯卡奇科夫学过农业，他还着手翻译过著名的农书《授时通考》（10），这是比丘林向他推荐的。但是他在其中没有找到实用的资料，因此去了农村，亲自从事农业生产。“第一次用中国犁耕地，——他在日记里说，——感到很累，但不是因为犁重，而是因为我是以俄国人的方式使犁，后来适应了，走得十分顺畅。”1853年，他不仅在笔头上写农业，而且进行了试种：60种蔬菜，23种瓜，26种豆，16种谷物，20种水稻，22种高粱，7种药用植物，17种药用根茎植物，26种果树，90种野花，40种家花。从这份清单可以看出他探索中国农业，态度如何认真。斯卡奇科夫跟京郊二散庄的一个农民交了朋友，那人教给他当地的耕作技术。“我的伙伴，更准确地说，我拜的教授，中国农业导师，外号叫魏张的人，将在我的实验田里和我一起工作……作为这个专业的最佳的顾问导师；

①K.A.斯卡奇科夫：《中国概况》，第133页。

②K.A.斯卡奇科夫：《中国概况》，第31页。

③K.A.斯卡奇科夫：《中国天文学的命运》，第20页。引文所指为他1873年交给博物馆的收藏的图书。

④H.维谢洛夫斯基：《K.A.斯卡奇科夫（悼文）》，第99页。

我在俄国已经打过这方面的基础,我通过中国典籍对它已经有所认识,它([中国]农业)绝对可以成为合理经营的典范,不单独对于俄国,而且对于西欧也莫不如此。关于这一点,在欧洲迄今还没有人发表过任何文字,甚至没有人说过一言半语,除了我们的老前辈汉学家比丘林之外。比丘林出版了一本修士大司祭魏若明摘自《授时通考》^①的薄薄的译文。一个求知心切的经营者想要通过这本书品尝中国农业的真谛,但是他却咀嚼不出任何确实的信息。”

斯卡奇科夫是第一个注意到中国野蚕饲养的欧洲人,留下了 1000 页有关中国养蚕业的笔记。他从山东聘请来一个有经验的养蚕人,把北馆(即俄国传教团院内)的花园变成了养蚕场。斯卡奇科夫向彼得堡寄去了野蚕茧,饲养野蚕的白蜡树和柞树的种子,以及由其原料制成的织物样品。他写道:“我认为我所寄去的一切将是无比珍贵的礼品,这些首次经过俄罗斯进入欧洲的野蚕,将给俄国带来荣誉,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将成为俄国与西欧共享的财富。”但是,尽管斯卡奇科夫把 1000 个蚕茧寄到了俄国,他的建议并没有真正引起任何人的兴趣,虽然“国家财产部颁给了斯卡奇科夫一枚大金质奖章,表彰他在北京进行的繁育家蚕及半野生蚕方面的学术和实践工作,以及提供说明、图像、蚕卵及丝绸样品”^②。斯卡奇科夫 1858 年得悉,从中国仅带回 50 个柞蚕茧的法国童文献神甫在欧洲出了大名,这个蚕种用他的名字命名,俄国学术刊物发表了童文献文章的译文。这使他感到十分沮丧。

斯卡奇科夫试图介绍给俄国居民的,不仅有野蚕,还有各种常见植物。他对苜蓿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一篇关于苜蓿的文章,很快译成法语刊登在《Revue d'Orient》^③上。后来又给农业博物馆寄去 56 普特(差不多 900 公斤)苜蓿种子^④,希望博物馆在全国推广。为他关于蚕的论文(1862 年)写的编者前言中说:“斯卡奇科夫在向我国介绍中国的有益植物方面为祖国做出的贡献,非在他之前到过中国的任何人所能比……我们能在俄国推广中国苜蓿(*Medicago sativa*)和许多菜园及花园植物,要感谢他的不懈操劳,他不断地将这些植物大量

① Земледелие в Китае с семидесятью двумя чертежами разных 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их орудий, СПб, 1884. (《中国农业 附 72 幅农业工具图》, 圣彼得堡, 1884 年)。比丘林出版了维·莫拉切维奇(魏若明)的《授时通考》摘要,并加大量修正。

② Н.维谢洛夫斯基:《К.А.斯卡奇科夫(悼文)》,第 99 页。

③ Скачков К.А., Китайская Му-сю // Труды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о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863, т. 1, вып. 3, с. 58-62. (К.А.斯卡奇科夫:《中国苜蓿》,《皇家自由经济学会著作丛书》,1863 年,卷 1,第 3 册,第 58-62 页。)法译情况见维谢洛夫斯基悼文第 100 页。

④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写本部,全宗 273,纸箱 123,第 7 号。

寄给俄国的农业局和私人爱好者。”^①

斯卡奇科夫不仅关注农业，还关注各类制造业。他的日记中有“中国工艺”部分，涵括“酿酒，制砖，……棉布，丝绸，麻布，绒布，玻璃及粘土制品，制陶业，象牙制品等等方面”^②。他深入当地作坊，提问请教。可以说，他是注意到中国建筑和制造业成就的第一个俄国人。1875年，他写道：“即使对中国仅略有所知的人，也无不会认同，中国人不仅能干，而且是出色地能干。这次只看看各类技术吧。他们的拱顶和拱门至今坚固地矗立在长城上，那是基督诞生两百年前开始建造的。他们的农业及其各个部门可以作为欧洲的典范。他们的大运河……是水利工程技术的典范。他们的汉白玉拱桥、水闸、渠道数百年不毁。他们的灌溉系统是最优秀的。他们的纺织、瓷器、铸造、旋工、木工、雕刻、镶嵌、纸张制品，他们的印刷、油漆、绘画艺术使得两个半球一切有教养的民族惊讶不止。而他们是向谁学习的？当然不是向外国人。他们的老师是他们自身的本性，其公认的特征就是多才、勤劳、优雅的趣味。他们的趣味是任何一个外国模仿者都无法迎合的。”^③同时，斯卡奇科夫公正地写道，中国人对外国的新事物从来不拒之门外，“当中国人见到有可能向他们（耶稣会士）学习天文学、钟表制作及其他技术时，为此并不在意请外国人到北京钦天监和宫内作坊任职，接纳他们对建造新观象台的建议，为了从法国购进最好的天文仪器和工具，是不吝金钱的”^④。

斯卡奇科夫不仅从事气象与天文观测，研究农业与各类手工业，他对各阶层居民的日常生活也有兴趣，描述了他们的各种习俗（生日，婚，丧，新年及其他节日，上自皇帝下至平民的中国各阶级的家庭生活，男女儿童的培养和教育，学校，商业和店铺，戏院和澡堂，刑法，监狱和刑罚，以及中国军队的生活方式，武备学堂及其他）^⑤。他起始于1854年的手稿《中国习俗》有323页。他的日记中有24页标题为《农村日常生活：温泉乡日窝村生活实录》。我想，这些尚未发表和研究的资料当前具有无可争议的价值。斯卡奇科夫记录的不仅有谚语，还有各种迷信和兆头。例如他收集的水手迷信和预言，恐怕是我们在其

① Скачков К.А., О деревьях, на которых китайцы разводят диких шелковичных червей // Журнал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1862, т. III, № 7, с. 33. (К.А.斯卡奇科夫：《论中国人培育野蚕的树木》，《农业杂志》，1862年（卷三）第7期，第33页。)

② Собрание бумаг, собственных ученых работ и некоторых рукописей Константина Адриановича Скачкова // Отчет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и Румянцевского музеев за 1873–1875 гг. М., 1877, с. 38. (《康斯坦定·安德里安诺维奇·斯卡奇科夫文件、本人学术作品及若干手稿汇编》，《莫斯科公共图书馆及鲁勉采夫博物馆1873–1875年度报告》，莫斯科，1877年，第38页。)

③④ К.А.斯卡奇科夫：《中国概况》，第57–58页、第59页。

⑤ 见《斯卡奇科夫文件、本人学术作品及若干手稿汇编》，第37页。

他文献中找不到的。

大家知道,斯卡奇科夫时代,中俄、满俄词典都还没有出版,传教团每个成员实际上都在自己编词典。斯卡奇科夫也是这样做的。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6月15日至10月4日为休息期。词典已完成一半,由马礼逊译出240页^①,自选成语200页,总计16500个词组,我从中学到很多。我放下了全部日志,即这份报纸的(他对《京报》及其他报纸进行大量摘译)和农业的日志,从6月15日起,连观测结果都不记录了。”晚些时,1857年返回彼得堡以后,他才完成了他的词典并准备付印。但由于俄国没有中文铅字,词典未能印出。斯卡奇科夫将手稿带到中国,交给一个汉口商人出版(很可能是我们下面将要谈到的罗季昂诺夫),后来手稿落到俄国领事奥斯特罗维尔霍夫手里,然后交给了他女儿,最终被带到了美国^②。这个手稿现在何处,杳无音信。

与广泛关心各类知识同时,斯卡奇科夫也密切注意着中国的时事。除了一般日记,他专门记了一份《政治日记(日志)》。声势浩大的太平军起义期间,他在北京,逐日记录从《京报》和北京人的街谈巷议中汲取的一切新闻。这份标题为《太平军起义日子里的北京:目击者札记》的日记,经M.C.米亚斯尼科夫和П.Е.斯卡奇科夫整理,在莫斯科出版于1958年,即事过一百年之后。

斯卡奇科夫作为观测站站长,在北京度过近十年。1857年患病,回到彼得堡,因通晓汉语而被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翻译。1859年被任命为驻中国新疆塔城领事,停留至1863年,回国后再次被任命为亚洲司译员。四年之后,1867年,被派往天津任领事,1870年起年被任命为驻中国各开放港口总领事。直至1879年他才最终返回彼得堡,四年后,1883年3月26日,死于肺病。他在中国度过的时间,加起来超过25年。

俄国传教士及派往传教团的医生或学员,学员任务是学习语言,斯卡奇科夫和他们不同,是一个兴趣极为多面的人。传教士们关心的是中国的宗教学说和历史,主要是中国边疆地区及边疆民族的历史,以及“官方的”中国(不要忘记,他们所受的都是各种东正教学校的宗教教育,对实学不感兴趣)。而斯卡奇科夫,前面说过,又上过工业学校,又上过大学,又上过里舍利厄学校学农业。固然,在他之前,驻北京传教会学员柯瓦尔科(地质学家)40年代回国后化名“德明”发表过涉及中国生活方方面面的一系列文章,试图展示一个“非官方”的中国。但是他的地质学家的学识,在中国没能找到用武之地,在汉学中也没有留下显著的痕迹。

斯卡奇科夫一开始学汉文,就着手收集不同学科的书籍。当然在他之前,俄国传教士和学员们就不断购置涉及他们所关心的各种问题的书籍,运回国

①即 R.Morisson (1782-1834).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Languages*, v.1-2, Shanghai-London, 1865.

②见 П.Е.斯卡奇科夫:《康斯坦定·安德里安诺维奇·斯卡奇科夫》,第26页。

内。科学院、外交部亚洲司、1818年建立的亚洲博物馆等单位的图书馆及皇家公共图书馆的藏书,因而不断得到汉籍补充。如1820年赴北京的第十届传教团监护官E.Ф.季姆科夫斯基领受的一项任务就是为亚洲司图书馆、皇家公共图书馆和拟建的伊尔库茨克华文学学校购置书籍。他完成了使命,但一共只买到了几十种图书。从北京携回大量图书的当然是比丘林。他1821年回俄国,带了汉文和满文书籍12大箱,地图和图谱六大卷。这批行李被视为如此珍贵,为了完整无损地运到彼得堡,甚至派了一支队伍沿途护送^①。

喀山大学派往中国实习的王西里(В.П.瓦西里耶夫)1840-1850年间,用大学拨付的资金购买了需要的书籍:中国史籍,文学作品(包括小说和弹词类),儒家经典,佛教和道教著作。1855年喀山大学东方系并入彼得堡大学,因而他收集的全部图书都转至彼得堡,至今收藏在彼得堡大学东方图书馆。根据王西里在他的《中国文学史资料》^②一书的附录中所编制的目录,我们可以看到他购书的情况。目录中对562种图书做了详细著录,包括:佛教、道教、儒家典籍,诸子哲学著作,历史与地理书籍,律法与治理文书,目录与辞书,医学、农业、手工业、音乐和绘画书籍,文艺作品,丛书。其中王西里携回最多的是历史类(108种)和地理类(108种)图书,以及文学类书籍(131种)。引人注目的是,王西里购买的主要是著名的,可以说是“官方的”著作。不属此例的则是小说(62种)和弹词(10篇)。这远远不是个完整的数据,因为藏书中除了标号Xyl(刻本)的书籍,还有不少标号为BY(王西里上课用的)的旧书。

斯卡奇科夫进行图书收藏,一开始便是按照与别人不同的原则。1873年他从天津写给莫斯科鲁勉采夫博物馆馆长B.A.帕什科夫的信中说:“阁下想必知道,本人一出大学校门,就被命运抛到了中国。在此间生活,学习,已逾四分之一世纪。在中国各地及北京如此漫长逗留期间,我曾利用一切机会买书。我仔细检视了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各图书馆,彼得堡亚洲博物馆及公共图书馆内的汉文藏书之后,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方针,即在中国主要只购买上述各馆所没有的善本书籍。有时为一本书,或因其内容罕见,或因其版本珍贵,或因其年代久远,我花几十卢布也心甘情愿。”^③当然要考虑到,他这样一个外国人被敲竹杠,也是常有的。日记中有一则记载可资证明:“走进一家书铺,但有人暗地打招呼向我多要钱,我什么也没买成。”^④斯卡奇科夫给帕什科夫的信里接着说:

①О наряде конвойных для идущего из Китая обоза с книгами и картинами (《关于为来自中国的图书图画运输队配备护卫事》),中央国家彼得堡历史档案馆,全宗1286,目录3,文件68。

②Васильев В.П.,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литографированные). СПб, 6/г, с. 216-286. (В.П.瓦西里耶夫(王西里):《中国文学史资料》(石印),圣彼得堡,无出版年,第216-286页。)

③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档案,目录1,存档单位186,第165-166页。

④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写本部,全宗273,纸箱18。日记,第2部,第9页(1月27日)。

“这样,我终于发现自己成为了一批稀有的汉文及部分满文藏书的拥有者。”

斯卡奇科夫第一次回国后,1864年曾想把自己的藏书出售给国民教育部,但该部以“财务困难”为由,给以回绝,尽管斯卡奇科夫提出可以在六年或八年之内分期付款。此后东方学家 M.И.布罗塞院士推荐把这批藏书买来交给亚洲博物馆,博物馆向科学院要经费,但科学院也借口缺乏经费而拒绝收购。

1867年赴天津任领事之前,斯卡奇科夫留给同事汉学家 Д.А.彼谢罗夫(1833-1913)一份委托书,他在1867年8月26日给彼谢罗夫的信中说,他与 А.Д.伊万诺夫斯基^①商定了售书的条件,那人负责把藏书卖掉。“如果此事毫无结果,则可以把收藏卖给法国东方学家鲍奇耶^②。这里所说的只包括交给彼得堡公共图书馆保存的15只木箱中的1435册书籍和抄本。第十六只木箱则不属于我要卖的藏书,[其中]存放的是没有编号、没有列入目录的图书。”^③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到,60年代,斯卡奇科夫的藏书已经由收藏者做了严格的分类和著录。在他的手稿里,保留了三种目录。一种称为《斯卡奇科夫收藏汉满籍目录(Catalogue of books Chinese and Manchu to bibliotheca Mr.C.A.Skatshkoff)》^④封面有他用毛笔写的中文字迹:公侯伯子男,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思骑尉。可以推测,斯卡奇科夫是想用中文表达自己的姓氏,“斯卡奇科夫”这个字来源于动词“斯卡卡奇”(骑马疾驰),因而中文的各种写法里都有一个“骑”字。这种目录里,所有作品都写了中文篇名,只有原无标题的手稿,斯卡奇科夫才用俄文简要注明其主题。他把全部藏书按22个类别进行分类,逐一标明每类图书的编号。为了了解他的收藏的内容,我们把他的类目表全文摘引如下:(以下编号数字有重叠处,原稿如此。)

- 1.神学 1-45
- 2.行政 46-127
- 3.历史与年表 121-281
- 4.地理,统计与民族学 282-464

① А.Д.伊万诺夫斯基(1823-1873),俄罗斯史学家,文学家。

② 斯卡奇科夫 1857-1858年在巴黎与法国汉学家鲍奇耶(Jean-Pierre - Guillaum Pauthier, 1801-1875)相识。斯卡奇科夫通过他的关系取得了利用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书的权利,常常在那里工作到很晚(Скачков П.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7, с. 162-163.[П.Е.斯卡奇科夫:《俄国汉学史纲》,莫斯科,1977年,第162-163页。])。1865年,斯卡奇科夫专为鲍奇耶整理出版的新版《马可波罗游记》,在彼得堡地理学会做了一次报告(Скачков о заслугах венецианца Марко Поло п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ю познаний об Азии // Известия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865, т. 1, № 11-12, с. 207-226.[《斯卡奇科夫论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对传播亚洲知识的贡献》,《俄国地理学会公报》,1865年(卷1)第11-12号,第207-226页。])。

③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写本部,全宗273,纸箱13,第7,第2页。

④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写本部,全宗273,纸箱10,第6页。

- 5.水文学 465-501
- 6.政治,国民经济,工业,商业 502-567
- 7.科学类:哲学,心理学,数学,天文学,星相学,自然史等,医学等 568-809
- 8.艺术 758-809
- 9.考古学,古钱学 810-825
- 10.文学。经典及其注疏。文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narratives),戏曲 826-1103
- 11.类书,资料,日记等 1104-1141
- 12.课本。传记 1142-1169
- 13.书目 1180-1191
- 14.定期出版物 1180-1191
- 15.杂类 1192-1233
- 16.地图集 1234-1277
- 17.水文图集 1278-1295
- 18.天文图 1296
- 19.地图 1297-1334
- 20.水文图 1335-1349
- 21.天文图 1350
- 22.图册 1351-1378
- 满文书籍 1379-1435

斯卡奇科夫在每一页上都注明该页登录的书籍、文书及抄本的数量。在第2页上做了总计:“共计[图书]10289本,文件733件,抄本375件。满籍56种(300本)”,下面写着 $11540+300=11840$ (数字不符)。斯卡奇科夫还编了一份《斯卡奇科夫藏书汉籍与满籍检索表》(俄译)^①。从这份检索表里可以看到,他不是单纯地买书、藏书,而是在查看,在阅读。例如,他对抄本444号(现为292号)《西域闻见录》做了如下著录:“有关中国新疆及其邻国的记述,包括俄罗斯在内。”

在第二种即《我的中国藏书目录》^②中,斯卡奇科夫采用了更细的分类法,把全部书籍和抄本划分为45类,而不是22类。单列出植物、动物、矿物、军事、统计、历史、礼仪、历书、教派、清帝著作等类别。他把文学分为5类:诗歌,戏曲,小说,神话与寓言,笑话。

在上面引述过的1873年10月15日写给鲁勉采夫博物馆馆长的信里,斯卡奇科夫提供了一些与10年前编制的清单不同的数字。他在这封信里说,他

①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写本部,全宗273,纸箱10,第8页。

②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写本部,全宗274,纸箱10,第7页。

“成为了一批丰富而稀有的汉文及部分满文藏书的拥有者，内有汉文著作 1378 种（刻本 1115 种，抄本 263 种），10912 册；另有满文著作 57 种（刻本 53 种，抄本 4 种），785 册，总计为著作 1435 种，11697 册（不难发现，原为 11840 册，此处变为 11697 册。抄本原为 375 件，不知为何变为 263 件——鲍·李福清）。为使我的藏书获得更大价值起见，我用了一年多时间，致力于为其编制一份符合学术体系的目录。阁下检视这份目录，便可看到，这批藏书，就其在人类知识各个领域中的完整性和多样性，确属优秀，其独特而新异的视野，是延续逾千年的中国文明自古所具有的。在……图籍之中，有属于 16 世纪甚至 15-16 世纪之交中国文学黄金时代的版本；有论述俄罗斯的著作，有画工精美的彼得大帝肖像（见名人画册，目录 1351 号）；有许多著作，即使在中国最好的私人藏书中也属罕见，值得夸耀……1850-1856 中国发生大叛乱期间，贵胄之家纷纷愿意售书，我幸运地利用了这个机会；我在中国准噶尔（塔城地区——译者注）居留的四年间，凭借地方长官对我的友谊，我以低廉的代价获得了有关这个地区的大量稀有抄本。这批藏书是我呕心沥血，毋庸讳言，也是我对中国文献悉心钻研的成果，我对它无比钟爱，想到我死之后它可能落入外行人手中，可能被拆散、丢失，我便感到恐惧。”

斯卡奇科夫担心他花了如此巨大精力和资金收集的藏书的命运，并非多虑。它的确是可能被拆散，部分书籍是可能丢失的。致帕什科夫的同一封信中有这样的说法：他“早已决定，我死后它（藏书）将整体交付阁下，用以扩充您所管辖的各博物馆的馆藏。”这是否真心话，颇可怀疑，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之前，他曾试图将这批收藏卖给彼得堡的图书馆，甚至卖给法国。

“但不久前”，斯卡奇科夫接着写道，“我获得一个机会，使我有可能会在我生前就实现我的意愿。在中国经商的俄国商界人士，伊尔库茨克一等商人安德烈·利沃维奇·罗季昂诺夫和他的一位合伙人（姓名我稍后将禀告阁下），为配合不久前举行的彼得大帝诞辰 200 周年庆典活动，基于爱国热情，产生了以实际行动表达对俄国首位改革者感激之情的愿望，彼得大帝为我国与中国的关系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依靠这种关系，我们今日才享有我国在这个帝国中的全部贸易利益。为此他们正寻找机会，为俄国人的共同利益做出一定程度上符合我国对华关系目标的某种贡献。他们的愿望是以教育为目的，促进俄罗斯人对中国的更好的了解。在他们进行的过程中，获得了我向他们出让我的藏书的同意。对于我的建议，即把他们所购得的藏书捐献给莫斯科公共博物馆和鲁勉采夫博物馆，安德烈·利沃维奇·罗季昂诺夫及其合伙人欣然接受。将我的藏书安置在我国古都，安置在这个我国输华制造业及对华贸易关系的中心点，他们和我一样，[认为]是最适宜的最佳的选择。因为迄今为止在莫斯科还没有一个藏书场所，无论公立私立，能找到远东的书籍。”

应当说明，斯卡奇科夫并提帕什科夫管辖的两座博物馆，并非随意。鲁勉采夫博物馆 1861 年由彼得堡迁至莫斯科后，就与刚刚在莫斯科大学收藏品及

大量捐赠品的基础上建立的莫斯科公共博物馆合并了。

斯卡奇科夫说得不错,在收到他的数量巨大的藏书之前,总的看来,鲁勉采夫博物馆里只有少数几本汉文书。图书馆手稿部保留着一份标题为《汉文译员对[帕什科夫]大人所购书籍的注记》的几页记载^①。从这记载中可以看到,所购书籍就只有汉、满文书籍两部,卷11和卷111。据译员注记,内容包含“古代辩术文书,对君王的告诫,或中国周代君王故事与笑话”。他们引为例子的是11卷的故事“宋智汉不收宝石”或111卷的“鲁王欲对犬戎宣战”(疑为“周穆王征伐犬戎”之误——译者注)。除了这两本零散不全的卷帙,记载中说还购入了“三种开本较小的汉文小说或故事书”。看来这就是先前收入鲁勉采夫博物馆的全部汉籍了。斯卡奇科夫似乎并不知道,那时候对汉文书籍感兴趣的还有东方学家,精通梵语、阿拉伯、波斯及其他东方语言的莫斯科大学教授П.Я.彼得罗夫(1814-1875)。他死后,他的汉文书籍,包括小说、广州的木鱼书,送进了大学的图书馆。但是其数量很小,一共只有几十种。斯卡奇科夫决定把藏书交给莫斯科,无疑是明智之举,因为彼得堡已经有了其他人从中国带来的汉籍。

斯卡奇科夫在给帕什科夫的信中也谈到藏书的价格。“很难说我购置这批图书付出了多大代价,正如画廊的专家和主人难以估价他收藏的每一件原作。大致计算,我为此花费了不少于2万5千卢布,虽然它的价值可能更高。”我们不知道罗季昂诺夫为这批藏书付给了斯卡奇科夫多少钱,只有一点是知道的,19世纪70年代,两万五千卢布是个很大的数字。斯卡奇科夫在信中写道:“罗季昂诺夫及其合伙人授权我把原属于我的藏书运交接收人,我正加紧履行此项荣幸的任务,随函向您管辖下的两座博物馆发运……汉文及满文图书十五大箱,另有藏书目录卡片一纸盒(1435张)。”

给帕什科夫的信,同时还附了一份《图书管理员须知》,从中可以看出斯卡奇科夫对他的藏书是多么爱护和细心。《须知》写道:书籍“分别用绳索包扎成小捆,每捆绳索上穿有一个硬纸标签,写明捆内著作的号码(按书目),装入15只木箱。每种著作均按书目编号。每只木箱盖上写有该箱内著作的号码。每只木箱均用粗席包缝,用麻绳捆扎,粗席上面写有箱号和字母L.S.(中国书籍)。”^②

帕什科夫收到来自彼得堡的图书后,1873年10月23日给斯卡奇科夫写了一封感谢信,其中说道:“首先务必向阁下致以真挚的谢意,您以您所藏图书这样珍贵的贡献,为丰富我的下属机关,给予了见识高超的协助。毫无疑问,对莫斯科公共博物馆的此项捐献,将给俄国汉学家带来巨大的裨益,您将这批藏

^①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写本部,全宗255,第14-32号。

^②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档案,目录1,存档单位186。

书安置于该馆的爱国愿望,有助于教育与科学事业,并将获得应有的评价。”^①帕什科夫在同信中还写道,按照《有关为博物馆付出特殊努力及提供重大捐献》的规章,此事将经由国民教育部禀报皇帝陛下。此外还说,《呼声》日报对藏书进馆将做报道。

把图书收藏交给鲁勉采夫博物馆的时候,斯卡奇科夫对帕什科夫提出了一些要求。第一,他请求馆长允许俄国汉学家把汉籍借回家,不住在莫斯科者也可(当时莫斯科没有汉学家)。他也可以为自己的写作从莫斯科取书,“当然遵守一切必要的手续”。他写道:“如果我不把我原来收藏的必要著作重看一遍,我的许多有关中国的论著是无法完成的。我迄今发表的有关中国的所有东西,仅限于一些小册子和报章上的杂谈,我在俄国逗留的时间总是十分短暂,[我无法]认真地校订什么东西。如果能够不再去中国,我将会发表一系列有关中国的著作,但这有赖于我是否有机会在彼得堡找到稍许独立的生活方式和充足的生活保障。”^②

应当说,博物馆对待得到的藏书,态度很认真。负责上架的图书管理员极可能懂汉文,否则很难设想,不懂语言,图书馆员怎能发现第52号《律法大典》缺143-152卷,或者1311号《江宁府地图》是一册没有号码的书籍(8开)^③。

博物馆收到数量如此庞大的收藏之后,请求罗季昂诺夫再捐献1000卢布,以便购置陈列中国藏书的书柜^④。看情形这项请求得到了满足,虽然不是全部。

这里不妨讲几句商人罗季昂诺夫。据斯卡奇科夫所写,他具有荣誉公民的称号,“在汉口经商,在茶叶贸易和我国手工业商品方面与莫斯科商人们有广泛的往来。”^⑤斯卡奇科夫在他的《中国概况》一书中写道,“今日罗季昂诺夫理应被认为是汉口最优秀的[茶叶]专家之一。”^⑥罗季昂诺夫捐钱买下斯卡奇科夫的藏书,盘算着能获得一枚勋章,但得到的却是“荣膺大仁至圣金质奖章,配以彰示忠勤之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绶带”^⑦。罗季昂诺夫对此颇不满足。当鲁勉采夫博物馆又向他提出请求,希望他捐出1万2千卢布,用以买下莫斯科大学И.Д.别利亚耶夫教授的藏书(几乎纯属编年史性质的100件抄本,始自14世纪的2000多件古俄罗斯历史和律法文书)时,又提出了勋章的问题。然而,关于可否授予罗季昂诺夫三等斯坦尼斯拉夫勋章一事,呈报了国民教育部长之

①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档案,目录1,存档单位186,第173页。

②同上,第167页。

③同上,第182页。

④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档案,第167a页。

⑤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档案,第165a页。

⑥K.A.斯卡奇科夫:《中国概况》,第99页。

⑦《莫斯科公共图书馆及鲁勉采夫博物馆1873-1875年报告》,莫斯科,1877年,第77-78页。

后，部长注意到罗季昂诺夫不到一年之前曾获得配有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带的金质奖章，就“表示，如果罗季昂诺夫能将上述（别利亚耶夫的）藏书赠与博物馆而无任何先决条件，则伯爵（部长）极愿为授予该人以可能获得之奖励，在适当时机提出申请。”^①

斯卡奇科夫究竟收集到了哪些东西？其中除了抄本，还有许多足称善本或写有批注和补充的刻本。斯卡奇科夫收藏中最古老的是元刻本《棋经》，可惜缺少标明书坊的扉页，但有至正七年和九年，即1347年和1349年的序，附有班固、皮日休、马融、吕公等人简短的棋论。还有刘仲甫的《棋诀》，此书未见于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中国国家图书馆仅有明代重印本。斯卡奇科夫收藏中有若干明版，如道教经文，其中《上清灵宝济度大成全书》，据每页中缝粗浓黑口，可断定刊印于明代上半叶，斯卡奇科夫本人在书目中注明此书约出版于1433年。另一些道教经文，斯卡奇科夫也断为明代。其他书中值得一提的，例如有收自一位桐城藏书家的《狮山掌录》，看来只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这个版本。收藏中还有不少堪称善本的清代图书，如内府四色本《古文渊鉴》。还要指出，这部渊鉴，图书馆里还有一本，也为四色，但不仅颜色，而且眉批，都有些不同。如开头第5页上有西山真德秀的批注，为斯卡奇科夫收藏的版本所无。除了一般的圆点，那本书上还有标明特别欣赏之处的圆圈。

有些书里还加进了有意义的补充。例如，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2006年看过斯卡奇科夫的收藏之后，在徐松《西域水道记》一书中发现了一系列用毛笔书写的作者补充。我们知道徐松1848年去世后，斯卡奇科夫买下了他的藏书（或是部分藏书），这本书便归他所有了。甚至斯卡奇科夫藏书中那些刊印于他在中国工作期间的书籍，也有一些是中国国家图书馆里没有的。这里应特别指出一个刻本，即《俄国孔总领事来函》，斯卡奇科夫中文姓名为“孔气”，孔总领事就是他本人。公函中仅写明月份，属于什么年份，很难确定。本书没有扉页，不知道刊印的地点。斯卡奇科夫被任命为总领事是在1870年，函件自然归属70年代。中国刊印俄国领事的函件及中国当局的若干回函，这是我们所知的唯一一例。1869年的《文学书官话》、或1855年香港出版的《粤音切要》（Chinese Phonetic Vocabulary），同样未见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应归于善本之列。有关赴古巴的华人劳工的资料，无疑是有价值的。这类资料有：《译华工进古巴章程说》，还有1851至1862年古巴岛华工清册，其中录有1176人的详尽资料，注明每人的原籍和职业（写有“呈谨将亲历古巴岛各城乡讯各华工口供汇造清册”字样）。

除书籍外，斯卡奇科夫还收集报刊。他保存的报纸，也有中国国家图书馆

^①俄罗斯国家图书馆1875年3月31日致博物馆函副本。写本部，全宗273，纸箱13，第14页。别利亚耶夫藏书送进了博物馆，但不知罗季昂诺夫是否参与此事。

缺藏的,例如,自1875年6月14日至同年11月5日上海发行的《益报》,或1876年10月8日至1877年12月27日的《新报》^①。毫无疑问,对斯卡奇科夫全部收藏进行详细著录时,还能发现其他图书馆可能没有保存的孤本。

斯卡奇科夫对文艺作品也有兴趣。他购买小说,不仅买众所周知的,也买不甚流行的,其中有一部曹去晶《姑妄言》稀有的抄本(1730年作者序)。这部小说在台北出版后,中国大陆出现了几乎十种盗版,令人遗憾的是,其中任何一版都没说这部小说是斯卡奇科夫藏书中保存下来的,或不说它的发现地,或臆造说抄本是在上海发现的,或说是在与作者同时代的书评家林钝翁家里发现的,等等。关于这部小说,陈益源、陈庆浩、王长友发表了论文。斯卡奇科夫本人曾着手翻译著名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但可惜没有完成。

作为中国口语和文学的专家,斯卡奇科夫被聘为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教授,请他教学生阅读《红楼梦》和《金瓶梅》(但一年后他去了天津)。

在抄本目录中,还有两部从未刊印过的传奇。其中一部《财星照》,见于旧时目录,但无印本^②。另一部《三财福》则完全不为人知。

斯卡奇科夫收藏的抄本中,本文作者注意到一份似乎并不那么重要的268(1179)号抄本,即很像是书店老板的胡宫才编写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标有书价的售书目录。作为中国叙事文学专家,我特别感兴趣目录中的小说部分,其中除小说外,还有弹词。除了尽人皆知的作品外,还可以见到当代书目未收的作品,例如一套《反三国》,又如《川三国》,也是一套。或者可以推测它是《三国演义》的某种四川版,但罗贯中的鸿篇巨著,一套书哪能容得下?那《反三国》是什么?还有《奇观浪史》,是孙楷第与大塚秀高通俗小说书录未著录的一部色情小说。所以连这类似乎不很珍贵的抄本,不仅能为中国图书贸易史,也能为中国小说史提供资料。

正像斯卡奇科夫给帕什科夫的信里写的那样,他特别为购进图书和抄本感到自豪。他在《中国概况》这本小册子里写道:“彼得堡、伦敦和巴黎的公共图书馆汉文图书及写本部里,没有任何有关所谓教派(即白莲教及三合教)的资料。而在莫斯科,在公共图书馆以及鲁勉采夫博物馆的汉籍部,书目24号,存有一种珍贵的罕见抄本,三册,16开,内有白莲教的符字;另有25号,讲白莲社及其信徒,三册,8开,1826年出版。”^③斯卡奇科夫指的是他的藏书185号(24号,现为185号)写有各种咒语及护符的《伏魔灭叛关帝大法》,以及刻本《戡靖教匪述编》。他的收藏中实际上还有两部这个主题的书:(旧219号)《平定教匪纪略》,其中开列了142名被歼毙的白莲教徒的名单(中国国家图

①美国国会图书馆对中国报刊的大量收藏中,没有这些报纸(据 *Chinese Periodical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1978)。

②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625页。

③K. A. 斯卡奇科夫:《中国概况》,第55页。

书馆有一个书名相似但不相同刻本。是否同书,必须对比原文才能判断)。

《K.A.斯卡奇科夫所藏汉籍抄本与地图题录》尽管内容详尽,录入的仍不是他收藏的全部抄本、舆图和绘画。2006年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写本部请求我继续对抄本进行著录。这时发现,斯卡奇科夫藏书中有一定数量的图书,原先没有著录过。例如,大臣鍾峻的抄本《奉使江西龙山纪略》、《奉使吴越纪略》、《奉使查看蒙古军容纪略》、《奉使盛京纪略》、《敬承堂诗抄》。又如,盖有翰林院铃印的《举笔不忘规谏赋》。

该图书馆的另一部门新近还发现了一盒斯卡奇科夫的收藏品。里面是拓片和舆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卷长18米的防御墙图,那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平定苗族起义后在湖南修建的。图中绘有各类工程450项,如望楼、关卡等等,以及附近的苗寨,所绘工程的名称均写在小块白纸贴签上。40张大块红纸贴签上写着地形说明。无论中国国家图书馆,无论《寻根》(2002年第3期)杂志(有文章为证),都没有见到过。新发现的舆图中,不仅有手绘的,也有木板印刷的,如一张很有趣的河南省图,角上印着瑶族节日的画面。在他的收藏中还有一张《禹迹图》,如斯卡奇科夫在卡片上所写:“似为绍兴七年(1137)拓本。蓝底阴文。”

一般认为斯卡奇科夫藏书中全部抄本、舆图和图画都是集中在全宗247的。但是我在全宗273他本人的手稿中完全意外地发现了一叠有趣的图画,根据一位无名画师所做的哪个细部应涂何种颜色的标注,这是一些供彩印或手工着色的画稿,如杨柳青制作的那种。这可能是画幅为30×24厘米,42×36.8厘米,44.5×28.8厘米的民间年画画稿。主题类似年画,带有简单题词。例如,丁郎寻父图上写的是:丁郎本姓杜,湖广来寻父,到了响城,得了安身处。其中也有像“月高走的荒,秃子赶月亮,加力往前奔,一天一个光上光”这类戏谑的词句。图画中有四张画幅为44.5×23.8的彩绘,构图奇特。一张上画着三个人像抬轿似地抬着一张桌子,桌上有一花瓶,瓶里插着一朵莲花,莲花上站着白蛇娘子,图画标题是《白蛇彩莲》。另一张标题是《东宾喜牡丹》^①,画着三人抬桌,桌上坐着吕洞宾,顶上有个小娘子。一幅描绘《铁弓缘(画中误写为“园”)》剧情的画也很有意思。笔者调查十多国家中国年画收藏未见这类年画。此外,在俄罗斯抄本全宗(273号,第15盒,编号11)内还发现一张线板年画残本,画的是停泊在天津港口的英法(写为“天津三岔河口英拂”)船舰(63.5×54厘米),中国未见收藏。

如果拿现已著录的汉文抄本与斯卡奇科夫本人编的藏书卡片和清单进行核对,就会知道,现在发现的并非全部。例如1352号卡片上写的是“皇帝郊邸花园圆明园风景绘画集,11页,着色,1册,2开”。在《抄本题录》中,这个号码

^①将吕洞宾名字错写为“东宾”,其他仙人的名字也有错误,说明这是出于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民间画匠。这类错别字,在年画中极为常见。

(1352号,新277号)代表的是另一件完全不同的作品。1435个号码的全部图书都交给了鲁勉采夫博物馆,如果这本绘画集缺了,斯卡奇科夫在上面提到的关于若干欠缺的那封信里会说到的。还有几件抄本也没见到。例如《花鸟兽研究》(1835年用汉文写作,仅为消遣),又如《阜通弋坝游牧》等数件。

俄文书目中还有一些现在没有找到的抄本,如第510号著录的《论青苗法》。在《题录》的《新旧编号对应索引》中,与第510号对应的是第19号——王安石事迹摘录。在“赋税和徭役”类(新325-329号)里也没有这件抄本。斯卡奇科夫的513号(新329号)《关于塔城的赋役(1864年档案摘抄)》也不完全相符。《题录》第671号(新286号)也不相符。斯卡奇科夫写的说明中,有些信息,没有反映在出版的《题录》中。例如,《题录》的第315号(旧1333号)下没有说明这是标有卡尔梅克乡镇及游牧点的哈喇沙尔(焉耆府)地图。这个说明会吸引卡尔梅克(卫拉特)历史学者的注意。抄本“《元朝史记》Chen Bang Da”(疑为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万历三十四年(1606)的善本,情况也不明。现在的著录中,第31号(201)^①为《元史偶录》,19世纪初的手写本。不知道那个明代善本到哪里去了?《彩绘帝王画像集》也没有见到。标题为《钦天监》的抄本不知下落。缺失“万元号各类商品清单”及若干其他抄本。

必须说明,《题录》中的舆图,有一些目前在架上找不到。大约是摆错了地方,以后会找到的。

斯卡奇科夫给了博物馆15箱图书和抄本,他自己留下了第16箱。除此以外,他在1873年10月15日给博物馆的信里说过,他“还有不多的不久前在中国购买的书籍,我死后也要捐献。同样我也要把我收藏的纯粹有关远东的欧洲书籍全部捐献出来。”^②10年之后,1883年3月26日,斯卡奇科夫去世。当年7月30日,他的遗孀K.Φ.斯卡奇科娃致函博物馆,说斯卡奇科夫留下一份正式遗嘱,把藏书捐献给莫斯科公共图书馆和鲁勉采夫博物馆^③。她把汉籍抄本交给了博物馆。这在《题录》中逐项作了说明。《题录》前言引用博物馆的《报告》,说斯卡奇科娃交出了约900本图书,其中20种为抄本。现在斯卡奇科夫的卡片目录中已经不是1435件,而是1515件,他死后入藏的图书,列入卡片目录的,只有书籍(看来卡片是20世纪60年代做的)。

次年(1884年)4月,斯卡奇科夫的遗孀又写信告知鲁勉采夫博物馆,找到一封亡夫表示愿意把自己全部手稿交给博物馆的信。斯卡奇科夫的手稿收藏(有一些手稿我前面引用过)数量庞大。遗孀交给博物馆“40个很厚的文件

①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写本部,全宗274,纸箱10,第7页。

②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档案,目录1,卷宗186,第167页。

③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档案,目录1,卷宗318,第54页。

夹,作者对它进行过整理,想列出一份清单”^①。现在分装于27只纸箱,共有14795页。从这类收藏品的目录里可以看到,斯卡奇科夫不仅收集中国的书籍和抄本,而且收集驻北京传教团人员的手稿。阿瓦库姆·切斯特诺夫、传教团医生赛善(C.巴吉列夫斯基)和C.茨维特科夫、传教士斐奥菲拉特·基谢列夫斯基和其他如Д.西维洛夫等人士的手稿因此得以保存。当然斯卡奇科夫手稿遗产俄文部分主要还是他本人的手迹,其中有在北京和天津写的日记,一整夹商务报告,塔城杂记,以及有关中国天文学、农业等的大量手稿。应当说,斯卡奇科夫从来没有丢开过中国天文学研究。1874年2月22日,即他的汉籍收藏已交给鲁勉采夫博物馆之后,他给该馆馆长的信,也能证明这一点。他在这封写自彼得堡的信里(他从中国回国休假)写道:“我马上要去威尼斯,为了在该地图书馆阅读几份上世纪(即18世纪)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手稿,主要是有关天文学的。”^②

斯卡奇科夫的手稿遗产中,有涉及各个方面的笔记,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政治方面的,如有关和李鸿章谈话的记载。并且,他在他的已刊作品目录中注明,公开发表的关于李鸿章的论文,是根据他的口述^③。他的档案里存着三张李鸿章的名片^④,可以推测他和李鸿章会见不止一次。在这份全宗里还有斯卡奇科夫写的各种书评。如对王西里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对扎哈罗夫的《满俄字典》,对萨维利耶夫的作品等等。我想,对斯卡奇科夫丰富的手稿遗产应该加以认真的研究,其中有价值的内容都应整理付印。

斯卡奇科夫还有一方面的活动,有关他的文章都没有提到。除了书籍和抄本,他对古钱币也很感兴趣。与鲁勉采夫博物馆建立联系以后,他还赠送该馆一张稀有的成化年间(1465-1487)的中国纸币,并做了很详细的说明^⑤。后来他写信告诉博物馆,说当他收到从中国寄来的10箱行李之后,还将赠送他所收藏的中国钱币,“并附我的说明”^⑥。我们知道,鲁勉采夫博物馆的古钱币藏品1921年全部交到了历史博物馆,斯卡奇科夫的古币收藏看来就被放在那里了。

《题录》前言说,第一位查询斯卡奇科夫藏书的学者是日本历史学家羽田亨(1882-1955),在1914年。实际并非如此。1903年俄罗斯《农业》杂志就发

①《斯卡奇科夫文件、本人学术作品及若干手稿汇编》,第35页。

②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档案,目录1,卷宗186,第228页。

③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写本部,全宗273,纸箱10,夹4,第52页。

④同上,全宗273,纸箱13,第23页(斯卡奇科夫及其会见的中国官吏如郑藻如、翁同爵、沈桂芬等人的名片)。可惜未能找到关于李鸿章的论文。

⑤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档案,目录1,卷宗186。

⑥同上,第167页。

表过法国东方学家卡昂^①的一篇不长的论文。论文的编者前言中说,他是法国政府派去研究蒙古和中国的。但是由于他懂俄文,所以指示他“预先在俄国档案馆和博物馆研究有关俄国政府各个时代与中国政府关系的文件,查阅俄国书库存有的中国书籍和抄本”。卡昂特别感兴趣的是斯卡奇科夫收藏的中国地图。他写道:“它(收藏)送进博物馆以来,就没有人对它进行过研究,结果,其中的地图,西方汉学家至今还不知晓。”^②卡昂对斯卡奇科夫收藏的三张地图(第1301,1303,1306号)做了描述,发表了其中的一张。他在论文末尾写道:“此文目的不是对这些地图做细致的研究,而是提请汉学家们注意它们的某些令人好奇的特点。”^③我们没有资料说明此后有哪位汉学家(俄国或西方的)关心过斯卡奇科夫的收藏。甚至在享有权威的国际学术刊物《通报》登载了伯希和1925年看过斯卡奇科夫抄本后写的文章以后^④,也不知道有哪位学者曾来问津过。20世纪60年代以前,除了可能有个别汉学家外,恐怕没有什么人借阅过斯卡奇科夫的藏书。K.A.斯卡奇科夫遗产的宣传者是发表过一篇短文《被遗忘的K.A.斯卡奇科夫抄本收藏》的П.Е.斯卡奇科夫(是与K.A.斯卡奇科夫同姓者)^⑤。载有B.C.米亚斯尼科夫序言和П.Е.斯卡奇科夫专论的K.A.斯卡奇科夫日记《太平军起义日子里的北京》于1958年问世之后,俄国汉学家在清史研究,特别是1870年天津事件^⑥、白莲教^⑦、太平军起义^⑧的研究中,开

①Cahen., О некоторых китайских картах Румянцевского музея (с копией и 1 фотографией карты) // Земледелие, 1903, кн. II-III, с. 238-244. (Cahen: 《关于鲁勉采夫博物馆所藏若干中国地图(附地图翻印件及照片1张)》,《农业杂志》,1903年第2-3册,第238-244页。)

②同上,第238-239页。

③同上,第144页。

④P.Pelliot, Sur quelques manuscrits sinologiques conservés en Russie, Tong Pao, 1932, T. 29, pp. 104-109. (伯希和:《俄国收藏之若干汉籍写本》,《通报》,1932年,第29卷,第104-109页。)

⑤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57, № 1, с. 124-125. (《历史问题》,1957年第1期,第124-125页。)

⑥Монина А.А., Из истории тьянцзиньских событий 1870 г. // Краткие сообще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 55. М., 1962, с. 37-38, 40-43. (А.А.莫宁娜:《1870年天津事件史探》,《东方学研究所简讯》,第55期,莫斯科,1962年,第37-38、40-43页。)

⑦Поршнева Е.Б. Учение, Белого лотоса – идеология народного восстания 1796-1804 гг. М., 1972. (Е.Б.波尔什涅娃:《白莲教——1796-1804人民起义的思想观念》,莫斯科,1972年。)

⑧Илюшечкин В.П., Пекин в первые годы восстания тайпинов (по донесениям П.И.Кафарова и дневникам К.А.Скачкова) //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М., 1979, ч. 1, с. 165-183. (В.П.伊留舍奇金:《太平军起义最初年代的北京(据卡法罗夫的报告及斯卡奇科夫日记)》,《П.И.卡法罗夫及其对我国东方学的贡献》,莫斯科,1979年,第1部,第165-183页。)

始利用他收藏的抄本。后来,П. Е.斯卡奇科夫在他的《俄罗斯汉学史纲》^①巨著里也写到 К. А.斯卡奇科夫。这本书是由米亚斯尼科夫整理出版的。

毫无疑问,最重要的,是由 А. И.麦尔纳尔克尼斯精心整理并写了详细的编者前言的《К. А.斯卡奇科夫所藏汉籍抄本与地图题录》。

А. И.麦尔纳尔克尼斯(1905-1990)生于拉脱维亚里加市。1930年毕业于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1938年在北京大学实习。1956-1957年在列宁图书馆工作。看来当时就开始研究和著录斯卡奇科夫的抄本,后来当了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及以后的东方学研究所(1961-1982)研究人员,仍继续做这件事。在研究所期间,他是1983年问世的 И. М.奥沙宁(鄂山荫)主编的《华俄大辞典》的最资深的编纂者之一。为这项工作,А. И.麦尔纳尔克尼斯与该辞典其他编者1986年同获国家奖。任何人打开他编的斯卡奇科夫抄本《题录》,都能明白他为这件琐细的工作花费了多少精力和时间。做这件事的那些年,还没有现在具有的大量参考工具书,没有可能通过互联网从中国国家图书馆查询必要的资料。

抄本目录问世后,仅出现了两篇有关斯卡奇科夫收藏的不长的文章。从事中国图书著录工作的列宁国家图书馆女馆员 Н. В.莫罗佐娃写了一篇内容丰富的有关斯卡奇科夫收藏的中国史籍刻本的论文^②。她不仅对藏书中的著名史籍,而且对大量地方志(约100种)也给予注意,其中有一些没有载入1958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综录》^③。莫罗佐娃也提到堪称孤本的宁夏万历(1573-1615)版《朔方志》,目前仅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她也注意到一些历史和史地著述的不同版本的重要价值。例如魏源《圣武记》1826年非正式的初版本。我们知道后来的各版本剔除了若干违碍词句。论文强调说,史地书籍的文字经常被改变,所以有不同年代的版本作比较,是很要紧的。斯卡奇科夫显然明白这一点,所以不同年代的版本他都要买进来。如他收藏的《盛京通志》,有1736年48卷本,1778年130卷本,1820年32卷本,1852年48卷本。莫罗佐娃注意到的还有斯卡奇科夫购置的明代早期刊行的丛书,明代刊行的官方文书汇编,及其他珍贵资料。

一年后发表的文章,作者是国家公共历史图书馆馆员 С. В.阿尔希波娃^④。这是一篇已刊 К. А.斯卡奇科夫本人著作及有关他的文献索引。本文收录了斯

① П. Е.斯卡奇科夫:《俄罗斯汉学史纲》,莫斯科,1977年。

② Морозова Н. В.,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в коллекции К. А. Скачкова //

Четырнадцатая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М., 1983, ч. 2, с. 200-207. (Н. В.莫罗佐娃:《К. А.斯卡奇科夫所藏中国历史资料》,“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第十四次学术会议,莫斯科,1983年,第2集,第200-207页。)

③ 《中国地方志综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

④ Архипова С. В.,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о К. А. Скачкове //

Пятнадцатая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М., 1984, ч. 3., с. 225-228. (С. В.阿尔希波娃:《有关К. А.斯卡奇科夫的生平著作俄文资料》,“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第十五次学术会议,莫斯科,1984年,第3集,第225-228页。)

卡奇科夫 21 篇已刊作品,包括 1958 年出版的《太平军起义日子里的北京》。1856-1883 年有五种俄国杂志刊登过斯卡奇科夫的文章。凡利用过斯卡奇科夫档案资料或引用过斯卡奇科夫遗产的研究文章,以及关于他的百科词条,阿尔希波娃都登录在内。可惜的是,在斯卡奇科夫本人论文目录里,没有列入他在各种报纸上发表的文字。

例如,维谢洛夫斯基在悼文中提到他在《市场消息报》(1873 年 10 月 27 日)和《呼声》报(1882 年第 290 号)上发表的文章,两篇都是谈输入中国茶叶的海运问题的。悼文作者也写道:斯卡奇科夫在天津期间,还在英文和法文报纸上发表过评论(可惜没说篇名)。在 John Dudgon 写的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ecclesiastical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Russia with China* (德贞:《中俄政教志略》)里,根据斯卡奇科夫自述,列出了他的 65 篇作品的题目(见《斯卡奇科夫传略》,第 36 页)。П. Е. 斯卡奇科夫的《中国书目》(1960 年)列出他 25 篇作品。

《斯卡奇科夫所藏汉籍抄本与地图题录》的问世,吸引了国外学者的注意。А. И. 麦尔纳尔克尼斯为《题录》写的序言,1981 年有了中文译本(见冯蒸编著:《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中华书局,1981)。为了向西方学者介绍斯卡奇科夫的珍稀抄本,特别是从新疆带回的抄本,德国瓦尔拉文斯教授把斯卡奇科夫所藏若干涉及民族志的抄本(第 51-58 号)的文字说明译成德文;包括新疆地图集和单张地图(第 305-323 号)的新疆资料(第 287-304 号)的文字说明,他也全部译成了德文^①。

南开大学阎国栋教授详尽的《俄国汉学史》^②问世后,中国读者现在可以在其中找到不少有关 K. A. 斯卡奇科夫的资料。我想,《斯卡奇科夫所藏汉籍抄本与地图题录》中译本的出版,将是对这位孜孜不倦的汉学研究家和收藏家的很好的纪念。他曾醉心于中国,他把中国比作“屹立在土地之上的硕大无朋的巨石。它的组成部分经常受到周围影响,性质并非永远纯一,然而它们之间的联系却如此牢固,以致在其存在的许多世纪中,风化、碾磨、腐蚀、朽坏,都不能降伏它们。巨石的整体具有这样的坚固性,连四千年可怕的世界性事件都没能消灭它,甚至没能移动它一旦占据的位置。尽管许多强大的王国和民族已经消失了,关于他们,我们凭着对荒原中遗迹的研究,也仅能获得粗略的知识……但这块巨石却屹立至今,仍像以前那样稳固,那样独立。”^③斯卡奇科夫 1875 年这样写道,而历史证明了他的正确。

又:此文写作获得中国国家图书馆王萑女士与南开大学阎国栋教授帮助,这篇文章是我的老友中国文化部田大畏先生翻译的,非常感谢他们几位。

① Walravens H. Einige: ethnographische Manuskripte der Sammlung Skackov. Moskau/ Münchener Beiträge zur Völkerkunde. Jahrbuch des Staatlichen Museums für Völkerkunde München, Bd. 9, 2004, S. 275-288.

② 阎国栋:《俄国汉学史》,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731 页。

③ K. A. 斯卡奇科夫:《中国概况》,第 3-4 页。